

【珍藏版】

跟

毛泽东
学史



红旗出版社

薛泽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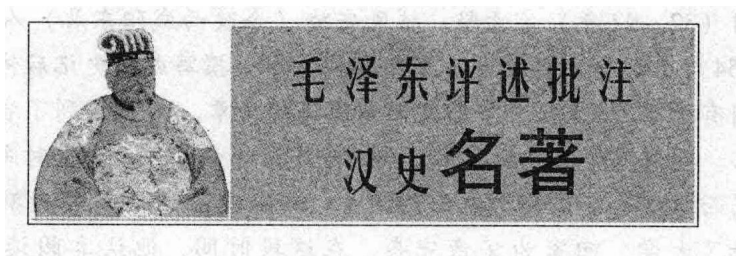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

跟毛泽东学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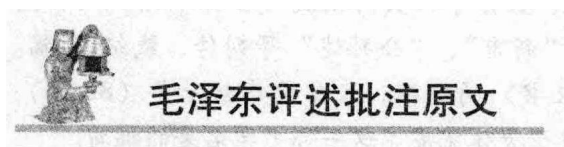
(中)

毛泽东

红旗出版社



毛泽东评述批注《汉书》



家英同志：

如有时间，可一阅班固的《贾谊传》。可略去《吊屈原》、《鹏鸟》二赋不阅。贾谊文章大半亡失，只存见于《史记》的二赋二文，班书略去其《过秦论》，存二赋一文。……

——摘自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，第 539 页。

说服力强之效。

——毛泽东读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的批语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第 125 页）



《汉书》述略

《汉书》共100卷，是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所编撰的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。

班固（32~92年）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东北）人。其父班彪（3~54年）广泛收集史料，博采遗闻佚事，撰写成《史记后传》65篇。

班固有很高的天赋，9岁时能写出漂亮的文章，16岁便到了洛阳，进入太学读书。他博览群书，读书不喜欢逐字逐句的分析，而注重对文章宏旨的把握，因而对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不精通。班固在23岁时，班彪病逝。班固于是离开了太学，回家为父亲守丧。在这段时间，他认真阅读了父亲的《史记后传》，认为《史记后传》仍不太完备，于是便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体例，编撰《汉书》。汉明帝永平五年（62年），有人向朝廷上书，告发班固“私改作国史”，班固因此被捕下狱。

班固的弟弟班超上书替班固鸣冤辩白，救出了班固。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，对班固的才学十分赏识，便任命他担任了兰台令，负责编撰东汉开国以来的历史。班固与陈宗、尹敏、孟异等人共同撰成《世祖本纪》。同时，他又撰成了“功臣”、“平林”、“新市”、“公孙述”等列传、载纪28篇。汉明帝于是命令他继续完成《汉书》的编撰。汉章帝建初七年（82年），经过20余年的艰苦写作，班固终于大体完成了这一部史学名著的编写。

《汉书》记事，上起汉高祖元年（前206年），下迄王莽地皇四年（23年），记述了整个西汉一代230年的史事。计有本纪12篇，表8篇，志10篇，列传70篇，共100篇。后人将其中篇幅过长的单卷分为上、下卷或上、中、下卷，如《高祖纪》分为上、下卷，《外戚传》、《匈奴传》、《西域传》等也分为上、下卷，《王莽传》分为上、中、下卷，《五行志》甚至分为“上”、“中之上”、“中之下”、“下之上”、“下之下”五个分卷。这样，《汉书》实际上就变成了120卷。

从体例上看，《汉书》尽管沿袭《史记》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的记事方式，去掉了“世家”，将其内容放入“列传”，并把“书”改称为“志”，但在本纪、表、志、列传，特别是“志”的具体形式上却也有创新。改“书”为“志”，原本是因为《汉书》本身既然叫“书”，那记典章制度这一部分也就不好再叫做“书”了。但班固在改《史记》的“八书”为《汉书》的“十志”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。如，把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合为《礼乐志》，《律书》、《历书》合为《律历志》，改《封禅书》为《郊祀

志》，《天官书》为《天文志》，《平准书》为《食货志》，《河渠书》为《沟洫志》，又新增了《刑法志》、《五行志》、《地理志》、《艺文志》，而且它的记事比《史记》更详细，更有系统。如《五行志》尽管是讲五行灾祥，但也保存了不少自然现象的史料；《刑法志》是记载军制和刑法的，为政治史的重要内容；《地理志》则是记载地理沿革和行政区划的；《艺文志》则是目录学最早的专著，使人们得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。总之，“十志”的创立是《汉书》最为成功的地方。因而以后的纪传体史书，都沿用“志”这种体例来记载典章制度了。

从史料来源上看，对汉武帝太初年间（公元前104至前101年）以前的记述，《汉书》基本上是抄自《史记》；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的记述，《汉书》则主要是在班彪的65篇《后传》的基础上撰写的。但是，班固自己也增补了大量的史料，特别是诏令、奏疏、文章，如《贾谊传》中增加《治安策》，在《晁错传》中增加了《募民徙塞疏》、《教太子疏》、《言兵事疏》，在《李广传》中增加了《武帝奖誉诏》等。因而使《汉书》的内容比《史记》更为丰富、更为充实。同时，班固还对《史记》和《后传》的文字作了增删改易，改正了《史记》的不少错误。尽管在对人物描述的生动性上，《汉书》不如《史记》，但在记述的准确性上，《汉书》却超过了《史记》。

《汉书》的缺点主要是班固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，因此多以封建的正统观念、儒家的正统思想为准绳来评价历史和品评人物，以极力维护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，而缺乏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那种人民性和同情心。另外，《汉书》喜用古文字和古句法，是二十四史中最难读的史书。在它问世之时，东汉人读起来都感到有相当的困难，连当时的著名学者马融都曾跟着班昭学习《汉书》。因此，替《汉书》作注的人比较多。在唐代以前，仅有名的《汉书》注家就有23家。唐代的颜师古集众家之长，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，写成新注。清末的王先谦吸收唐以后研究《汉书》的成果，征引有关著作达67家之多，撰成《汉书补注》。近人杨树达所撰的《汉书窥管》、陈直所撰的《汉书新注》、吴恂所撰的《汉书注商》，也是研读《汉书》的重要参考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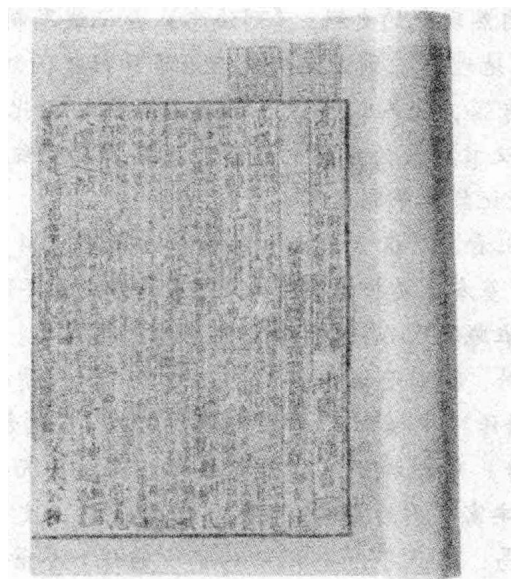


学习参考

《汉书》是毛泽东阅读最勤的正史之一。毛泽东读《汉书》，尤其喜欢



读《赵充国传》。敢于坚持真理的西汉名将赵充国，一直是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一位历史人物。



汉书书影

50年代末的一天，毛泽东和周谷城在中南海游泳后，两人并肩坐在遮阳伞下谈古论今，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本线装书，翻到了某一页看了一眼，就说：赵充国这个人，当年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，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他的主张在开始时，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；到后来，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，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，反对的却只有十之一二。真理要人接受，总要有个过程，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。毛泽东拿的这本书就是《汉书》，他翻的这页是《赵充国传》。

毛泽东在读《汉书》时，还对贾谊这个人物给予很大的关注。贾谊，汉文帝时官拜太中大夫，因主张改革而被权贵所妒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。几年后，文帝召他回京，任文帝之子梁怀王太傅。后因梁怀王坠马丧生而郁闷死去。毛泽东对此十分惋惜，他曾在《汉书》中批注道：“梁王坠马寻常事，何必哀伤付一生。”毛泽东十分欣赏《汉书》中贾谊的《治安策》一文，该文文笔朴实犀利，感情真挚，是一篇极好的政论文。

《后汉书》写得不坏， 许多篇章胜于《前汉书》



毛泽东评述批注原文

《后汉书》写得不坏，许多篇章，胜于《前汉书》。

——毛泽东在《后汉书》第21册封面上的批语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第131页）

李贤好，刘放好。

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，确然无疑。裴松之注《三国》有极大的好处，有些近于李贤，而长篇大论，搜集历史资料，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。

——摘自芦荻：《毛泽东读二十四史》
（见《光明日报》1993年12月20日）

西汉高、文、景、武、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，东汉两头均无意思，只有光武可以读。

——摘自张贻玖著：《毛泽东读史》，
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8月版，第31页。

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

——毛泽东读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的批语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第133页）

（将《黄琼传》、《李固传》）

送刘、周、邓、彭一阅。

送陈毅同志一阅。

可读李固给黄琼书。就思想、文章而论，都是一篇好文章。

——引自张贻玖：《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》，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00页。



《后汉书》述略

《后汉书》共120卷，其中本纪10卷和列传80卷，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曄编撰的，志30卷则是由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撰写的。

范曄（398~446年）字蔚宗，顺阳（旧治在今河南浙川东）人。范曄出身于官僚世家，其祖父范宁曾任东晋的豫章太守，生父范泰因拥立宋武帝刘裕有功而官拜金紫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。范曄因过继给堂伯父范弘之，而袭封了范弘之武昌县五等侯爵位。

范曄是一个博学多识、很有才华的人。《宋书·范曄传》因而称赞他：“少好学，博涉经史，善为文章，能隶书，晓音律。”他早年投奔在刘裕之子、彭城王刘义康门下，担任过冠军参军、右军参军等职。其后又历任秘书丞、新蔡太守、尚书吏部郎等职。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九年（432年）冬，35岁的范曄因行为不检点而得罪了刘义康，被贬为宣城太守。数年后，范曄被提升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，加宁朔将军，累官至左卫将军、太子詹事。元嘉二十二年，他与谢综、孔熙先等人一道谋立刘义康为帝，因被人告发，于同年十二月（446年1月）被捕处死，年仅48岁。

范曄一生以文才自负，著述极多，但大都散佚了，只有《后汉书》得以完整保留，流传至今。

在范曄之前，记载东汉历史的著述已有10余种。其中，比较著名的有东汉的刘珍、李尤、伏无忌等人所撰写的《东观汉记》，三国时期吴国的谢承所撰写的《后汉书》、西晋的司马彪所撰写的《继汉书》、西晋的华峤所撰写的《后汉书》等。但范曄对这些史书都不满意，因此当他被贬为宣城太守时，由于政治上不得志，他便以《东观汉记》为主要依据，并参考谢承《后汉书》等众家著述，斟酌取舍，删繁补缺，开始撰写《后汉书》。他原计划写本纪10卷、志10卷、列传80卷，合为100卷，并有序传。经过10多年的努力，他在被处以死刑之前，已经完成了纪传部分的写作，但10志却最终没能定稿。

《后汉书》记事起自东汉光武刘秀建武元年（25年），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，记载了整个东汉一代共196年的历史。本纪10卷中有《帝纪》9卷、《皇后纪》1卷，在位短暂的小皇帝不便单独成卷，便附于其

他皇帝之后，因而《帝纪》9卷共记载了东汉12位皇帝的事迹。由于《光武纪》和《皇后纪》都分为上下卷，所以《后汉书》的本纪实际上是12卷。《后汉书》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一样，列传部分设有单传、合传、类传。但范曄根据东汉的历史特点，又创设了歌颂敢于反抗封建统治权威、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人士的《党锢列传》、《独行列传》、《逸民列传》，记载宦官专权的《宦者列传》，记载文学家事迹的《文苑列传》，记载方士活动的《方术列传》，记载优秀妇女事迹的《列女列传》等8个新的类传。在这些创立的类传中，《党锢列传》和《列女列传》最能反映出范曄史学的卓见特识。如《党锢列传》用同情和颂扬笔调，记载了党人名士的坚贞不屈的行为和气节，富有正义感，生动而感人。《列女列传》则与后世的《烈女传》只讲封建的“节烈”完全不同，入传的妇女，如女史学家班昭和女文学家蔡琰（蔡文姬），范曄所注重的主要还是她们的卓越才华。

范曄的文才和史学修养都比较高。他在撰写《后汉书》时，能够吸取司马迁和班固两家的长处，以简约的文辞来阐发精深的意旨，以严密的结构来记述一个时代的史事。因此《后汉书》无论从文字到内容，都是比较好的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。范曄对于自己所撰的《后汉书》是很自负的。

他在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中自称“吾杂传、论，皆有深意精旨，既有裁味，故约其词句。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《六夷》诸序、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。”这并非自我夸大之词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誉说：“范曄之删《后汉》也，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。”南宋文献学家陈振孙也赞誉说：“范氏删取《东观汉纪》以下诸家之书，以为一家之作。”因而，当范曄的《后汉书》问世后，大家争相传诵，以致其他各家的后汉书竟逐渐被人们淡忘、被时代淘汰了。

由于范曄的《后汉书》存有无“志”的缺陷，因此到南朝萧梁时期，刘昭在为《后汉书》作注时，为完善其体例，便取用西晋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中的八志，加以注释，分为30卷，以补《后汉书》之缺。不过，司马彪的八志与班固的十志比较，尽管新增了记载官制的《百官志》和记载车马、冠服等制度的《舆服志》，但却没有《沟洫志》、《食货志》、《刑法志》、《艺文志》，仍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。

到了唐代，唐高宗的儿子、章怀太子李贤在刘昭注释的基础上，在张大安、刘訥言等人的帮助下，参照各家之书，广征博引，重新为《后汉书》作了注释。后来通行的《后汉书》的注释，纪传部分就是李贤的注，而志的部分则是刘昭的注。



学习参考

毛泽东对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及其颜师古、李贤等人的汉书注本做过认真比较与研究，他在《后汉书》91卷至94卷第21册的封面上写道：“《后汉书》写得不坏，许多篇章胜于《前汉书》。”又在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中写了一则批注：“李贤好，刘攽。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，确然无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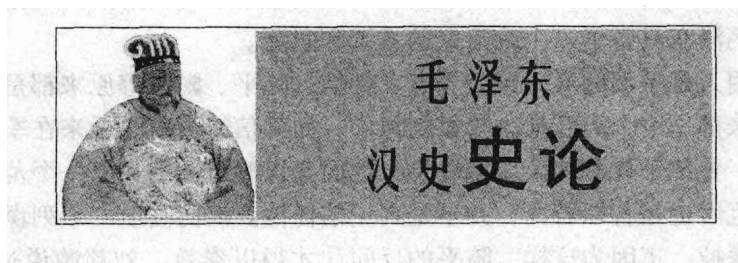
李贤的《后汉书注》，北宋刘攽的《西汉·东汉刊误》以及他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专修汉史的著述，究竟好在哪里？他们两人虽一为唐朝太子，一为北宋史学家，相距甚远，但他们编写注史的共同特点是千方百计搜集史料，对原著进行大量补充、订正，并无一般学者偏重考订文字之嫌。所以毛泽东称他们注史好就好在“长篇大论，搜集历史资料，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。”比颜师古好得很多，确实是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。

毛泽东不仅在总体上赞扬了《后汉书》比《前汉书》写得好些，还对两部《汉书》中的某些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：“西汉高、文、景、武、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，东汉两头均无意思，只有光武可以读。”这个评论，当是从《后汉书》所记的内容而言，因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，建国立基，开疆拓土，文治武功，景象不凡。东汉光武刘秀，乃“中兴之帝”，经历一番征杀，遂承续汉家基业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。

毛泽东十分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提取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。《后汉书》中记载着一个著名典故“梁上君子”，毛泽东十分同意陈寔传的做法，他批注：“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。”

《后汉书》中有篇《张鲁传》，记载了汉末张鲁设“五斗米道”，组织下层人民进行起义的故事。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人物，他在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上，亲自为《张鲁传》作注，印发给与会者。对其中“置义舍”、“置义米肉”（吃住不要钱），“各领部众，多者为抬头，大祭酒”（政社合一）等做法很欣赏。

尽管毛泽东对东汉的历史兴趣不大，但他还是很欣赏东汉士大夫的节操。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和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是毛泽东多次阅读的两篇人物传记。1965年，毛泽东还特意批示，将这两篇传记“送刘、周、邓、彭一阅”，“送陈毅同志一阅”。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彭真、陈毅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都认真阅读了这两篇传记。毛泽东之所以推荐这两篇传记，原因就是李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，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宁死不屈的气节，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。



刘邦胜了，项羽败了，不是偶然的

清朝史论家赵翼曾这样说过：当“四海鼎沸，草泽竞奋”之际，唯独汉高祖刘邦能够“以匹夫起事，角群雄而定一尊”，这是“气运为之”，是天意。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。其实自起兵以后，刘邦曾遭到过不少次失败，有时败得很惨，几乎是全军覆没。但败归败，刘邦每次都能够起死回生，重整旗鼓，转败为胜，以至于最终平定天下，“角群雄而定一尊”，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。

那么，项羽为什么失败？其失败原因，在毛泽东看来，崇尚“沽名”，是项羽一个明显弱点，也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中说项羽有“妇人之仁”，有很多事例都能反映出他的“沽名”和“妇人之仁”的性格。项羽率部经过苦战，击败秦军主力，赶在刘邦后面入关，两军发生冲突。由于项羽“为人不忍”，为避免“不义”之名，没有以四十万对十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，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。清代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新安何苦坑项羽，霸上焉能杀汉王。”悲乎哉！这个动辄可以屠城，可以毫不犹豫坑杀几十万人的枭雄，竟对一个人的生死这样踌躇，这应该是韩信所说的“妇人之仁”，但这是一种对输诚弱者的宽容，是一种讲究风度和气概不向弱者示威的一种英雄气度。然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，这种弱点是不可饶恕的，这也正是项羽

作为悲剧人物的可贵品质之所在。项羽在生命的最后说：“天亡我也，非兵之过也。”由于他自身性格的弱点，使他失去了一次次有利机会，以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和不正义的两种，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，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，在读《项羽本纪》的时候，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过分宽容敌人的态度的。

在解放战争的后期，毛泽东吸取了项羽的教训，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，这正说明毛泽东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睿智和聪慧。

不善用人是项羽的又一致命弱点。韩信、陈平、黥布等原来都是他的部下，但后来都一个个离开他去投靠刘邦了，而韩信恰恰就是后来在军事上彻底摧毁他、置他于死命的人。始终忠于他而又谋略过人的只有一个范增，但是项羽对范增也是若即若离，并不是真正信任他。鸿门宴上一系列谋划都被项羽白白送掉。正因为这样，陈平的反间计才得以奏效。刘邦曾说过：“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，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得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

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，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，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，都要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。他说：“有这样的情况：一切事情，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，这是很错误的。哪有一个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？……这样的第一书记。应当叫霸王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‘班长’。从前有个项羽，叫做西楚霸王，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。他那里有一个范增，给他出过些主意，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。……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，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，倒有点像项羽。这些同志如果不改，最后要垮台的。”从此以后，“西楚霸王”便成为党内批评作风不民主的代名词了。

1963年1月7日，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，曾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，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，放跑了刘邦；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，项羽认真了，而刘邦却不以为然，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；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，位置没有选好。在毛泽东看来，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，最重要的教训是“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”，即不能知人、用人，不肯纳谏，不听谋士范增的意见，本应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却反而放跑了他，本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，反而放弃了它。刘邦之所以取胜，一个是因为他能够得人心；一个是他知人善任，能博采众长，善于听取别人意见。而项羽则勇武善战，军力强大，但所到之处烧杀掠抢，失去了人心；且听不得不同意见，有良臣谋士弃之不用，最终导致失败。毛泽东恐怕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王不是政治家，而刘邦是政治家。一胜一败，历史留给了人们无穷的思考。

使人改过自新

此吏亦可不杀，教以改过，调改他职可也。

使人改过自效。

——毛泽东读冯梦龙《智囊》卷3《上智部·通简·朱博》的批语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第53~54页）

明朝末年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其编集的笔记小说《智囊》卷3《上智部·通简·朱博》一节中，首先记述了汉代冀州刺史朱博以才服人的故事。说朱博出身武官，对于做文官的那一套文法并不精通。他在刚任冀州刺史之后，就立即带领部属外出巡察辖境的情况。当行至一县时，有吏民数百人拦道上诉，说是要告状，吵吵嚷嚷的人群一时挤满了官寺。这时，一位随行的老从事便建议朱博暂且滞留此县处理这些诉讼，等事毕之后再继续巡行，目的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博的行政办事能力。朱博心中明白，遂通知准备车驾，出门去见那些拦道告状之人。面对众吏民，朱博镇定自若，他令从事向众人宣布说：想告县级官吏的人，各自到其所属郡衙去告，州刺史不直接监察县一级的官吏；想告郡级官吏的人，等本刺史巡行完毕回到治所后各自再来告；至于其他小官司，则各自到其直接管辖的部门找从事办理。朱博如此果断简明的处理，证明他有很强的应变办事能力，众吏民对此敬佩不已，于是四五百告状之人顷刻散去。后来朱博经过仔细调查，得知这次拦道上诉事正是那个提建议的老从事故意煽动吏民所致，于是一怒之下就将这个老从事杀了。

接着，冯梦龙又在书中记述了朱博调任左冯翊时期的一段故事。说当时长陵大姓中有个名叫尚方禁的人，年轻时曾因勾引有夫之妇而被人砍伤面颊。官府的功曹因为接受了尚方禁的贿赂，所以并没有惩治他，反而调他做了守尉。朱博听说此事后，就找了一个借口单独召见尚方禁，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。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经了解此事的底细，只得连忙叩头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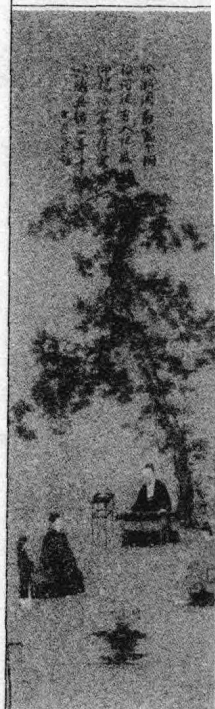
据实禀报了事情的经过。朱博笑道：“情欲之事，人所难免。我愿意为你洗去耻辱，可你能自己效力吗？”尚方禁又惊又喜，立即回答道：“万死不辞！”朱博于是命令他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这次谈话的内容，今后还必须为其充当亲信耳目，有情况直接禀报。此后，尚方禁在工作中一直很卖力，经常破获贼盗等犯罪案件，颇有成效，朱博就提升他为连守县令。过了很久，朱博又单独召见那位功曹，痛斥了他受贿包庇尚方禁的事情，并责令其将历次受贿之事一一写下来，不得有丝毫隐瞒，否则就杀他的头。功曹惶恐万分，只得如实地一一交代。于是朱博又责令他改过自新，可视其以后的表现再听候裁决，然后拔刀将其所写受贿罪状削成碎屑毁掉。此后，这位功曹一直战战兢兢，小心谨慎，工作上也尽心尽责，办事没出任何差错，朱博就重新重用了他。

毛泽东阅读古代文献典籍，不仅重视“二十四史”之类的正史，也重视笔记小说。他在1947年9月12日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就说：“你要看历史小说，明清两代人写的笔记小说”。范文澜在40年代送给他一部《笔记小说大观》，他一直珍藏着，后带至北京。1963年1月，毛泽东专门从章士钊那里借了一套线装本《智囊》来阅读，这部书是他最爱读的笔记小说之一。在这部书上，毛泽东作了许多批注，涉及对政治、军事、思想、文化等各方面的看法。

毛泽东在阅读了《智囊》中关于朱博以才服人，后因怒而杀掉肇事的老从事这段故事之后，即在书中批注道：“此吏亦可不杀，教以改过，调改他职可也。”显然，毛泽东并不赞同朱博怒杀从事的举动，认为那个从事虽然犯有错误，但是罪不至死，应该通过教育令其改过自新，然后再委以他任。接下来，毛泽东在读关于朱博对犯有过错的尚方禁和功曹进行警戒，后又重用二人这段故事之后，又在书中批注道：“使人改过自效。”显然，毛泽东认为朱博在对待尚方禁和功曹二人的问题上，其处理方法是正确的，并有可资借鉴的积极成分。

从上述毛泽东对于朱博为政之事而作出的一是一非的批注中，可以看出他对待犯错误者的一贯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。首先，毛泽东认为只要做工作，犯错误总是难免的，但关键在于改，而不是一棍子打死。其次，关于处理犯错误者的政策原则，毛泽东在《整顿党的作风》中就早已提出：“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：第一是‘惩前毖后’，第二是‘治病救人’。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，不讲情面，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，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，做得好些。这就是‘惩前毖后’的意思。但是我们揭发错误、批评缺点的目的，好像医生治病一样，完全是为了救人，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。”在1966年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

式上，他又说：“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，要准许改正错误。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，就不许他改正错误，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，一看二帮，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。”再次，毛泽东还认为，犯错误虽然是坏事，但对于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，消极因素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。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朱博怒杀从事的不当，又指出朱博令尚方禁、功曹二人改过自新之正确，这都和他关于犯错误的认识以及处理的政策原则是相吻合的。（唐华全）



陈寔教育梁上君子一事表明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

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。

——毛泽东读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的批语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第133页）

陈寔（104～187年）字仲弓，东汉颍川许县（今河南许昌东）人。陈寔是东汉末年的名士，年轻时曾当过县吏，尽管地位卑微，但他却喜欢读书，能诵读各种儒家经典。县令邓劭很欣赏陈寔的才干，便让他进入太学读书，其后，历任颍川西门亭长、功曹、太丘县（旧治在今河南永城西北）县长等职。

陈寔为官公正廉洁，为人讲究道德。因而官职尽管不高，但在当时的朝野却很有威望。民间发生纠纷，人们往往请他定是非曲直。经陈寔调解裁决后，当事人都心服口服，毫无怨言。因此当时流传有这样的乡谣：“宁受到刑法处置，也不愿受到陈君（陈寔）指责。”太尉杨赐、司徒陈耽常感叹陈寔地位与声望不符，对自己在陈寔之前担任了高官感到惭愧。

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中有一段记载：有一次，一个小偷潜入陈寔家，藏在房梁上，想等到夜深人静陈寔家的人都睡熟后行窃。陈寔发现小偷后，没有大喊捉贼，而是起床穿戴整齐，把儿孙们叫醒，召集到一起，严肃地说：“夫人不可不自勉。不善之人，未必本恶，习以成性，遂至于此。梁上君子者是矣。”小偷大吃一惊，从梁上跳下来，向陈寔谢罪。陈寔和气地劝说他：“视君状貌，不似恶人，宜深克己反善。然此当由贫困。”并让家人送给他两匹绢。此后，县中盗窃绝迹。后来的“梁上君子”这一成语即出自于此。

毛泽东对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中的这段故事十分注意，批注道：“人在

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。”毛泽东的这一论点，充分肯定了陈寔对小偷偷窃行为的认识和分析，以及他对小偷的教育和鼓励。千百年来，“梁上君子”只是用作窃贼的代名词，而毛泽东却能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，把它提高到了对人改造的认识高度。由此可见毛泽东读史的真知灼见。（杨倩描）

讲梁鸿的故事，教人立志气

《东观汉记》是东汉时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史书，叙东汉史，自光武帝至灵帝，共143卷。尚未完稿。唐以后多有缺佚，清代以来有辑本。

梁鸿是东汉初期的经学家、文学家。一生隐居。本为扶风平陵（今陕西咸阳市）人，曾因写《五噫歌》讽刺统治者的奢侈，汉章帝读后甚为不满，后改名换姓到南方，替人做工舂米。其本传列入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，其中无“不因人热”的故事，当是《东观汉记》撰修者搜罗。

毛泽东可能是在《东观汉记》里读到这则故事的。早在20年代，毛泽东便接触到这个故事。他把“梁鸿余热不因人”视为一种硬骨头精神的体现。

1959年3月2日，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集中讲了“梁鸿余热不因人”的故事。他说，东汉有个梁鸿，“举案齐眉”就是讲他的故事，他有个老婆叫孟光。他们穷得要死，给人舂米度日。有一个人对他说：“我这里有火，你用它来烧饭吧。”他说：我“小子鸿，不因人热者也”。你有热，我不沾光。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，成了经学家。这个人是硬汉。

1959年3月，毛泽东又讲起这个故事，自有特殊背景。1958年刮“共产风”，搞“一平二调”，损害了农村中许多相对富裕的生产队和管理区的利益，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。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纠正这种“穷拉平”的“左”倾错误。在郑州会议上讲述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，就是借以做思想说服工作，以便落实好退赔措施。毛泽东讲话的立场，明显是立足于穷者一方。他把不因人热，解释为“我们穷人，就是不要靠揩别人的油来过活”，这是很通俗而又恰当的。同时，他还说：我们中国穷，但是我

